

东亚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整合与 东亚区域合作的新走向^{*}

刘中伟

内容提要：伴随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东亚区域贸易体系和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越来越多最终产品的生产不是完全在单一经济体内完成，而是根据价值链的延伸被跨国公司分散在最有效率和成本最低的国家或地区，由此形成的贸易不平衡已不是简单的双边贸易问题，而是复杂的、网络状的多边贸易问题。驱动东亚生产网络发展和国际分工的动力仍然在外部市场，东亚依然缺乏一个能够推动区域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内需市场。文章认为，全球价值链整合中转移与升级的对抗，反映了对东亚生产网络主导权 and 治理选项的不同认识，也预示着未来东亚区域合作路径和制度的竞争。

关键词：东亚生产网络 全球价值链整合 区域合作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作者简介：刘中伟，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经济系讲师

2008年以来，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迅速蔓延，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遭受了巨大的冲击，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却十分强劲，在全球生产体系中表现尤为突出。2011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吸收外国直接投资（FDI）分别达到创纪录的6840亿美元和950亿美

^{*} 本文是国际关系学院校级科研重点项目“全球治理与中国崛起”（项目编号：3262013T13）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当代亚太》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当代亚太》2014年第4期，第126~156页。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Bimonthly)

元，其中，东亚地区^①超过 336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占全球 FDI 流入总量的比例从金融危机爆发前的 12% 提高到 22%。中国依然是对 FDI 最具吸引力的国家，2011 年吸引 FDI 高达 1240 亿美元，居全球第二位。截至 2011 年底，中国内向 FDI 存量约为 7120 亿美元，外向 FDI 存量约为 3660 亿美元。^② 全球的生产和消费中心正在不断东移，国际生产网络的演进和发展也越来越呈现出体系化、区域化和差异化的趋势。未来一段时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再平衡”与既有国际生产体系和分工格局的冲突和矛盾将更为严峻，中国所面对的各种竞争和挑战也将更为激烈。本文将从考察东亚生产网络的重构特征出发，说明东亚生产网络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关系与互动作用，进而分析美国以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代表的经济“再平衡”政策与东亚区域经济整合的制度竞争，解释其间中美两国的角色发挥和合作竞争的作用，从而对未来一段时期东亚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合作与竞争走向做出大致判断。

一、东亚生产网络的发展、变迁与动力

东亚生产网络最初是由“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ttern）演变发展而来的。但自 20 世纪末以来，伴随着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投资和生产战略的调整，东亚各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东亚地区的生产和分工形式逐渐形成了以“分散化生产”（fragmented production）为基础，遵循产品在价值链上不同生产环节展开的地区性分工，并通过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形成的多层次、网络状的新型区域生产体系。

（一）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区域生产网络的演进

分工“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③ “在亚当·斯密看来，它几乎是作为经济进步的唯一因素”。^④ 国际生产网络框架的形成是分工国际化

① 这里的东亚地区是指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五国（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后文涉及其他东盟国家时将予以说明。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2 年世界投资报告解读》，<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difang/anhui/201210/20121008397996.html>。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04 页。

④ J.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197.

的结果，是生产过程和地理空间、社会制度相结合的生产组织形式。^① 国际生产活动由原来主要是一国内部或区域间的分工转变成目前的全球范围内的分工，由工厂内部的简单流程扩展为一个遍布全球的巨大网络。这种新型生产模式的出现源于产品生产的价值链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全球价值链的生成和发展成为国际生产网络出现的重要微观基础。

1990年，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在提出“企业价值链”概念的基础上，又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将其理论的研究层面拓展到企业外部，并突出了价值链的空间分离。^② 格里芬（Gary Gereffi）首次将“价值链”概念推广到世界范围，并与国际产业组织联系起来，提出了“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 GCC）的概念，用以考察如何提升产品在国际产销体系中的竞争优势。该理论以“生产者驱动”（producer-driven）和“购买者驱动”（buyer-driven）两个模式来探究产品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升级。同时，他还特别强调了在构建全球商品链时需要注意投入—产出（input-output）结构、领域性、政治结构及制度框架等因素。^③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定义，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 GVC）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相比传统价值链在企业组织中的纵向维度特征，全球价值链是价值增值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体现，而全球生产网络则更进一步成为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高级形式。产品构成越复杂，生产工序越多，价值链的纵向维度就越长，并逐渐在组织规模和生产性主体上形成层级关系。与此同时，产业越庞大，进行专业化分工所获得的规模经济也

^① 吴锋：《生产边界与生产网络——全球生产网络研究述评》，载《上海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第103页。

^② 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于1985年首次提出了“企业价值链”（value chain）的概念，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在其内部建立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价值增值活动”（value added），使得价值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产生增值效应，最终产生的增值总和就构成了企业的“价值增值总和”。参见朱妮娜、叶春明：《全球及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研究文献综述》，载《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18页。

^③ Gary Gereffi, “The Organization of Buyer-Driven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How U. S. Retailers Shape Overseas Production Networks Commodi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 in Gary Gereffi and Miguel Korzeniewicz, eds., *Commodi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 Westport: Praeger, 1994, p. 74.

就越大。价值链横向维度的日趋发达，将从地理分布上不断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生产网络结构。^①

国际生产网络（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 IPN）的出现实际上是国际生产体系的重大变革，是对全球价值链发展、国际生产模块化与国际外包（outsourcing）、^②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③等国际化生产现象的总体概括，即跨国公司通过对世界各地的生产资源加以整合，采用投资建厂、模块化生产或业务外包等形式，建立起世界范围的工厂或“制造飞地”。在这一生产体系下，不同生产环节之间产生大量的零部件或中间品贸易，从而对所在地的进出口和就业产生重要影响。

在理论层面，亨德森（J. Henderson）使用全球生产网络概念时提出，“全球”意味着多种规模范围，即生产网络可以是全球的，也可以是区域的，而并不是说生产网络必须覆盖全球。^④ 厄恩斯特（Dieter Ernst）和古里耶里（Paolo Guerrieri）研究了日本、美国与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联系，其中主

① 斯特金（T. Sturgeon）等从组织规模（organizational scale）、地理分布（geographic scale）和生产性主体（productive actor）三个维度来界定全球价值链。从组织规模看，全球价值链包括参与了某种产品或服务生产性活动的全部主体；从地理分布来看，全球价值链必须具有全球性；从参与的主体看，包括一体化企业（如 Phillips、原 IBM 等）、零售商（如 Sears、Gap 等）、领导厂商（如 Dell、Nike 等）、交钥匙供应商（如 Celestica、Solectron）和零部件供应商（如 Intel、Microsoft 等）。他还对价值链和生产网络的概念进行了区分：价值链主要描述了某种商品或服务从生产到交货、消费和服务的一系列过程，而生产网络强调的是一群相关企业之间关系的本质和程度。参见 T. Sturgeon and J. Lee, “Industry Co-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a Shared Supply Base for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paper presented at Nelson and Winter Conference, Aalborg, June 12-15, 2001。

② “模块化”就是将原来的生产制造过程分解为一些功能和结构相互独立的标准模块，按产品生产的特定需求对标准模块进行组合而完成的生产，它直接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外包分工的发展。此外，外包生产、片段化生产和国际分离生产这三个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参见朱妮娜、叶春明：《全球及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研究文献综述》，第 19 页。

③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前提条件包括：一是产品生产要经过多个连续阶段；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在生产过程中提供增值；三是至少一个国家在生产过程中必须使用进口的投入品，其产出的一部分必须出口。其中第三个条件是垂直专业化区别于其他有关产品内分工和中间品贸易的关键。参见浦华林：《产品内国际分工与贸易对我国贸易平衡的影响分析》，载《国际贸易问题》2011 年第 4 期，第 15~23 页。

④ J. Henderson and P. Dicken, *et al.*,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9, No. 3, March 2002, pp. 436-464.

要关注了电子产品贸易。^① 安藤光代 (Mitsuyo Ando) 和森田福成 (Fukinari Kimura) 研究指出, 东亚机械行业生产网络比世界其他地区更为发达, 他们使用贸易数据和日本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相关数据系统地描述了东亚机械行业的生产网络。^② 同时, 他们还从企业角度分析了美日企业在东亚以及拉美的生产网络, 认为区域投资环境因素对推动生产网络发展更为重要。^③ 奥巴什 (Ayako Obashi) 采用 Kaplan-Meier 估计方法和 Cox 比例风险模型研究了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东亚生产网络的稳定性, 认为随着区域内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 东亚国家间建立了相对稳定的贸易联系; 同时, 建立在生产链基础之上的中间产品贸易与其他交易相比更具持续性。^④

在现实中,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国际生产网络的生产组织形式在区域层面的发展更加迅速。目前, 全球主要形成了三大区域性国际生产网络, 分别为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北美区域生产网络、德国与东欧国家 (如捷克、匈牙利) 之间的中东欧区域生产网络以及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区域生产网络。^⑤

相比之下, 东亚生产网络的空间分布非常广泛, 包括众多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或地区, 发展较为完善且特点鲜明, 主要表现在一般机械、电子机械、运输设备、精密仪器等机械制造领域的企业内和企业间生产关系非常成熟。^⑥ 更为重要的是, 区域生产网络的形成引起了东亚贸易结构的显著变化, 甚至改变了东亚经济体与域内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形式。厄恩斯特和古里耶里曾指出, “近四十年来, 东亚区域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加工制造基地。国际加工生产最初只是起源于东亚的个别国家, 但之后其重心很

① Dieter Ernst and Paolo Guerrieri,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Changing Trade Patterns in East Asia: The Case of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DRUID Working Papers 97-7, 1997.

② Mitsuyo Ando and Fukinari Kimura,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s in East Asia”, NBER Working Papers No. 10167, 2003.

③ 林桂军、汤碧、沈秋君:《东亚生产网络发展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深化》, 载《国际贸易问题》2012年第11期, 第4~5页。

④ Ayako Obashi, “Stability and Resiliency of Production Networks in 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Recession”, paper prepared for the 2nd GEP Confere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Ningbo, China, November 10-11, 2009.

⑤ Mitsuyo Ando and Fukinari Kimura,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s in East Asia”.

⑥ 刘德伟:《全球经济“再平衡”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论文, 2010年, <http://iaps.cass.cn/cate/1200-p4.htm>.

快转移到东盟地区，随之又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区域生产网络”。^① 东亚生产网络重塑了东亚经济体之间的分工结构，使区域内各经济体共享国际产业链分工的发展机遇，这对东亚区域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利益、国际经济关系和安全而言都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二）“雁行模式”的衰落与东亚生产网络的兴起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以产业转移和升级为背景，东亚地区形成了以日本为“领头雁”、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亚洲“四小龙”）为“雁身”、中国与东盟部分发展中国家为“雁尾”的，以产业间垂直分工为特征的“雁行发展模式”，从而使本地区保持了相当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然而，伴随亚洲“四小龙”大力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引进而引发的“经济起飞”，日本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产业内分工不断扩大，原本层次分明的分工格局在各经济体相互赶超过程中日趋模糊，“雁行模式”日趋式微。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雁行模式”作为后进国家的赶超型发展模式缺乏自生能力，创新型发展能力不足。根据“雁行模式”的产业转移与升级理论，后进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消化实现技术进步，但这是不可持续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后进国家在前向关联上难以摆脱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在后向关联上难以摆脱对日本技术和资金的依赖，始终与先进国家保持技术差距；另一方面，后进国家与先进国家的政策博弈过程始终受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影响，一旦国际环境发生不利于后进国家的变化，其发展和技术进步便后继乏力。

第二，日本多年的海外投资与技术复制，及其经济的停滞与衰退，使得“头雁”效应日渐式微。日本通过本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在东亚地区复制了国内的部分生产体制和技术成分，由此客观上构筑起日本支持下的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带动了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同时，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进入长达十余年的经济衰退期，已经难以承担“头雁”的角色。在这一背景下，“雁身”和“雁尾”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新一轮“东亚奇迹”。

第三，“雁行模式”下的产业间垂直分工模式日益让位于产业内分工和产品间分工，由此形成了竞争趋同、多种分工形式并存的复合型生产网络体

^① Dieter Ernst and Paolo Guerrieri,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Changing Trade Patterns in East Asia: The Case of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系。根据索普 (M. Thorpe) 等人的测算, 1970~1996 年东亚区域产业内贸易指数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从 1970 年的 24.04% 上升到 1996 年的 50.43%。^① 东亚各经济体间产业结构差异逐渐缩小, 产业间的互补性减弱, 竞争性增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东亚形成了纵横交织的新型网络分工体系。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 2001 年 5 月发布的《贸易白皮书》, 日本政府明确承认, 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雁行模式”发展时代业已结束, 并预言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亚洲将进入真正的“大竞争时代”。^② 然而, “雁行模式”的发展无疑加强了东亚各经济体间的经济联系和一体化程度, 为东亚各经济体通过重新布局分工体系构建新的区域内在增长机制奠定了基础。东亚生产网络的迅速形成和发展由此备受关注。

(三) 东亚生产网络新模式及其发展动力

在日本经济“头雁效应”衰退、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 东亚经济在不断调整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竹节型资本主义”(Bamboo Capitalism), 即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跨境生产协作、零部件和中间品贸易, 使东亚各经济体不断成长, 由此在东亚地区形成了多样性和充满活力的产业群链,^③ 亦即新型的东亚生产网络。总体而言, 东亚生产网络脱胎于“雁行模式”, 但又是对后者的巨大超越。

就其分工体系和增长机制而言, 吴 (Francis Ng) 和耶茨 (Alexander Yeats) 认为,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东亚经济体正在价值链的不同区段进行专业化分工 (或称“生产分享”), 其中, 日本及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专注于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生产, 而东盟各国和中国则在零部件组装方面实现了专业化。^④ 这种网络分工体系一方面将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和中国大陆等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形成东亚生产网络; 另一方面, 东亚生产网络

^① M. Thorpe and Z. Zhang, “Study of the Measurement and Determinants of Intra-Industry Trade in East Asia”, *Asian Economic Journal*, Vol. 19, 2005, pp. 231-247.

^② 刘德伟:《全球经济“再平衡”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前景》。

^③ David Roland-Holst, Iwan Azis, and Li-Gang Liu, “Regionalism and Globalism: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Trade Relations in Wake of China’s WTO Accession”, ADB Institute Research Paper Series, 2003, p. 16.

^④ Francis Ng and Alexander Yeats, “Production Sharing in East Asia: Who Does What for Whom, and Why?”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197, 1999.

将东亚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遍布全球的生产网络。^①

东亚生产网络的迅速发展，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要素禀赋、地理位置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构成了东亚生产网络发展的现实基础。产品内分工的实现要求在不同工序投入和使用的要素种类和比例各不相同，国际生产网络形成的基本条件就是存在经济体间要素禀赋的差异性，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报酬、人力资源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和产业配套服务、关税水平和贸易便利化程度等。东亚各经济体地理位置和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别决定了其各种要素禀赋的差异和区位优势的不同。由此，东亚区域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分别专注于不同生产区段的生产和加工，并不断积累各自在专业化程度上的优势，从而促进了东亚生产网络的有力发展。

其次，国际分工深化与技术进步成为东亚生产网络发展的内在动力。如前所述，国际生产网络的发展呈现出由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深化与并行的趋势。伴随全球产品价值链的不断延伸和细化，不同生产环节的要素密集特征与东亚各经济体的资源优化配置紧密相连，使得各经济体的参与度不断提高。技术进步导致交易成本迅速下降，随着运输工具、电子设备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物流、商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速度大幅加快，使用成本迅速降低，东亚地区形成了技术引导的产业间、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并存的复合型网络分工体系，从而促进了东亚生产网络的迅速扩张。

再次，东亚各经济体开放的贸易政策与区域贸易自由化成为东亚生产网络发展的制度保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各经济体的进口关税大幅下降，并大力推行鼓励出口加工的政策措施，主要表现为广泛运用出口退税政策，通过建立各种形态的出口加工区，促进本国企业参与加工贸易和产品内分工，对用于出口加工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进口间接实行减税或免税等激励政策；同时，实行多种投资便利化措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伴随区域贸易一体化浪潮，各经济体间纷纷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进一步放宽贸易和投资限制，使东亚生产网络日趋成熟与完善。

最后，跨国公司大量内部贸易和外包业务的兴起成为东亚生产网络发展的重要推手。近20年来，跨国公司与其子公司的企业内（intra-firm）跨境

^① 魏燕慎：《“雁行模式”式微 多元分工格局初现》，载《当代亚太》2002年第7期，第29～32页。

交易规模在国际货物贸易中所占比重不断扩大；同时，跨国公司还通过外包方式完成大量“臂长交易”（arm's length transactions）^①。通过这些跨境经济活动，跨国公司有力地推动了全球经济融合和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经济体日益采取外向型和大力吸引外资的政策，流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FDI以惊人的速度增长。2011年，东亚地区吸引FDI的规模超过3360亿美元，同比增长14%，占全球FDI流入总量的22%。虽然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投资使得部分工业制成品行业形成了明显的垂直分工模式，但随着大量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生产，与跨国公司具有的中枢型企业组织特征叠加，有效实现了国际分工的革新，并积累了有益的微观发展动力，推动了东亚生产网络的深入发展。

（四）东亚生产网络的发展与网络状三角贸易模式的形成

伴随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东亚区域贸易体系和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整体上，东亚区域内贸易比重大幅上升，但从贸易流向和商品结构来看，区域外市场对东亚地区经济与贸易的重要性有增无减。2010年，东亚区域内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出口仅占出口总额的38.7%和25.9%，欧美经济体的需求和吸纳成为东亚各经济体产品生产扩张的主要推动力，反映出东亚整体在最终产品贸易上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

日本及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不再直接对欧美出口最终产品，而是对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大量出口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并按工序在东亚各经济体之间流转，最终产品销往世界各地。^② 中国与美欧国家和东亚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比重持续上升表明，中国一方面正在成为东亚生产网络加工平台和核心枢纽，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仍然主导产品价值链流向；另一方面，中国对区域内经济体存在大量贸易逆差，对欧美等域外市场则存在巨额贸易顺差，从而成为全球贸易不平衡的“一极”。

因此，东亚地区正逐渐形成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在资本及技术密集型的零部件、中间产品生产环节实现前端工序与中间品出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从发达经济体进口精密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并完成组装（密集使用劳动

^① 臂长交易，即交易双方相互不存在所有权关系或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各方关于交易的所有决策仅仅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参见林桂军、汤碧、沈秋君：《东亚生产网络发展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深化》，第4~5页。

^② 刘德伟：《全球经济“再平衡”与东亚生产网络的前景》。

力)——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将组装完成的最终产品销往世界市场的“三角贸易模式”(triangle trade pattern)。而由此带来的贸易不平衡已不再是简单的双边贸易问题,而是复杂的、网络状的多边贸易问题(见图1)。也就是说,虽然基于东亚生产网络的生产阶段分工使得区域内贸易,特别是零部件等中间产品贸易比重提高,但东亚贸易总体上仍然依赖于外部世界对其最终产品的需求。驱动东亚生产网络和国际分工的动力仍然在区域外部,而非本区域内,东亚依然缺乏能够推动区域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内需市场。^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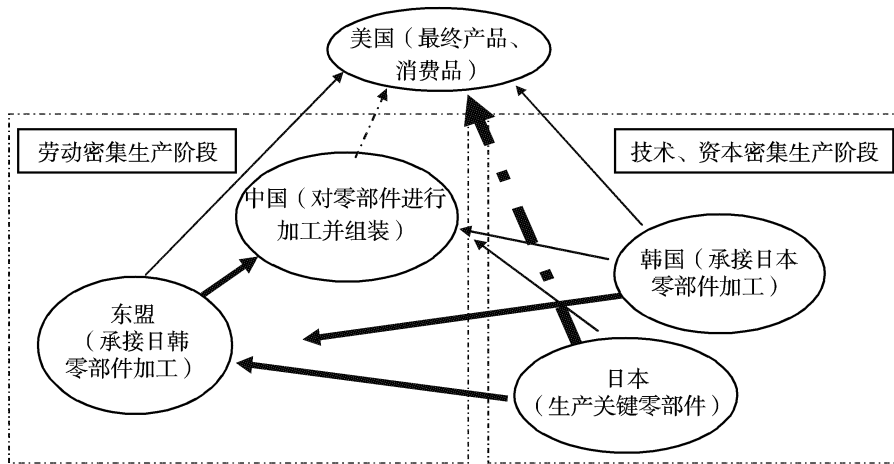


图1 东亚生产网络结构图

二、全球经济失衡与价值链整合冲突中 东亚生产网络发展的机遇

(一) 全球经济失衡的现实与东亚生产网络的结构性困境

2005年,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罗德里戈·拉托(Rodrigo de Rato y Figaredo)首次提出并界定“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即当前的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一方拥有大量的经常项目赤字,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东亚其他新兴经济体则对美国持

^① Guillaume Gaulier, Françoise Lemoine, and Denizal Kesenci, “China’s Emergence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Trade Flows in Asia”, CEPII Working Paper No. 2006-05, March 2006.

有大量贸易盈余。^①从本质上讲，全球经济失衡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就已经存在，且并未因其解体而消失，近年来更出现了不断恶化的趋势。伴随中国经济快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天平”中份量不断加重，产生了西方发达国家未曾预料到的结果和影响。

从最初单纯的美日贸易不平衡与贸易摩擦，到美国与日本、亚洲“四小龙”的贸易失衡，债务关系逆转以及汇率摩擦，再到东亚生产网络成熟与中国经济崛起后中美经济摩擦和贸易结构失衡成为焦点，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断积累形成巨额逆差，东亚各经济体净资本大量流向美国，美国与东亚间的经济失衡问题日益加剧。本文认为，这是在全球美元霸权体制下，美国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明显差异引发全球产业转移与东亚分工体系演变的结果（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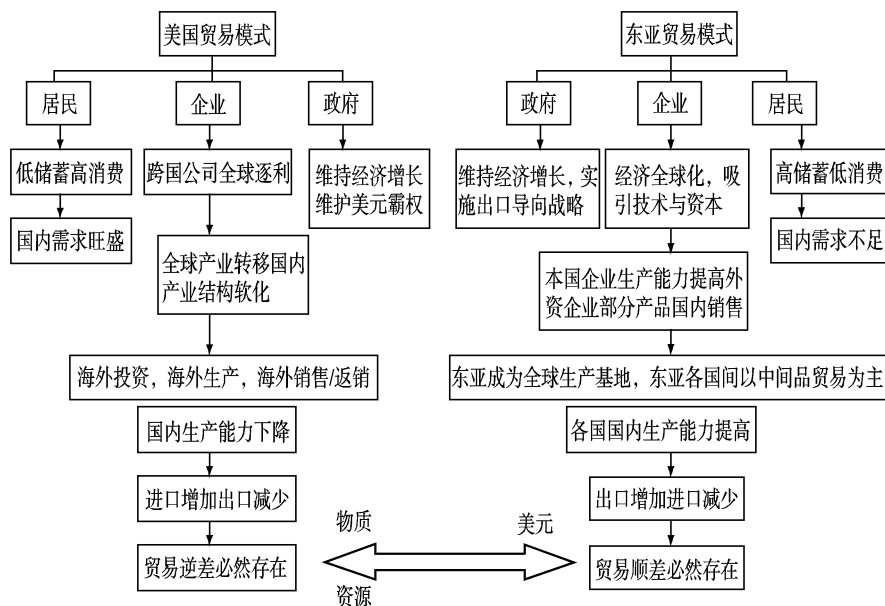


图 2 美国贸易模式与东亚贸易模式比较

资料来源：张海燕、宋玉华：《当前全球贸易失衡的机制及中国的地位分析》，载《世界经济研究》2009年第8期，第11页。

^① 马先仙、姜凌：《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可持续性与解决途径——基于国际储备供求关系视角的研究》，载《新金融》2006年第6期，第35页。

第一，美国战后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通过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形成了低利率、信贷刺激、鼓励个人消费等长期经济政策。巨大的消费需求既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也导致了其对进口产品的强烈需求。与此同时，东亚国家一方面实行以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推行各种出口鼓励政策，维持贸易竞争力；另一方面，在赶超经济理念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东亚国家普遍重生产轻消费，储蓄率居高不下，投资萎靡不振，国内消费市场严重不足，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和外部资金回流。

第二，全球产业转移与国际分工体系演变成为美国与东亚经济失衡的产业与结构原因。美国大量的中低端制造业、高技术产品的加工制造环节逐渐通过转移和外包等形式迁移至境外，同时大量进口消费品和制造产品满足国内需求。最初是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承接这些产业转移，随后，伴随东亚生产网络的构建，不同经济体依据各自在价值链上的不同位置，不断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形成了东亚内部的产业梯度关联格局，进而形成了网络状“三角贸易模式”。

第三，20世纪40年代，美元霸权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下来，虽然国际货币制度几经调整，但美元作为强势货币始终是国际贸易结算和国际储备中的核心货币。东亚各经济体为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普遍采取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成为美国与东亚经济失衡的货币根源。

就东亚生产网络而言，除了要正视全球经济失衡，特别是美国与东亚经济失衡的现实外，也必须面对其现实发展中的结构性困境。东亚生产网络价值链分工中出现的产业集中性造成了产业严重趋同，进而导致各经济体间的竞争性大于互补性。主要体现在：一是东亚生产网络的产业升级呈跳跃式，导致制造业中高科技产业对传统产业的促进和扩散效应较弱，难以迅速带动整体经济腾飞和结构升级；二是高科技产业一般风险较高，这是因为这类产业的技术和市场偏好更新速度快，产业受国际市场周期变动影响较大，极易出现产能结构性过剩，加之区域内各国往往会出现产业发展趋同问题，^①从而导致市场恶性竞争，造成产品滞销和积压；三是东亚生产网络在最终产品的生产环节上多集中在价值链中下端，核心技术和能力开发不足，上下游关联产业发展存在失衡；四是东亚各经济体市场需求和技术准备普遍不足，缺乏对新兴产业和新产品先

^① “产业趋同”亦称作“产业结构同构化”，是指各地区产业结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某种相似倾向，也可以用来指在各地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不断出现和增强的区域间结构的高度相似趋势。

行先试的市场基础和驱动力，难以摆脱产品生命周期末端位置，长期对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市场过度依赖。东亚经济体的出口在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由于欧美市场的全面萎缩而严重受挫就是例证。因此，东亚生产网络的未来发展不得不考虑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

（二）全球价值链整合的新动向：转移与升级的对抗

近十年来，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经营布局越来越向供应链整合发展，成本和风险仍然是企业战略考虑的第一要素。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背景下，企业分散风险的供应链设计显得尤为重要。麦肯锡咨询公司 2010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2/3 以上的跨国公司受访高管认为，全球供应链自身的风险在过去的三年里明显增大，在未来也将继续增大。^① 在这种背景下，全球价值链整合的新动向之一是：基于低生产成本考虑而盛行的离岸外包方式将逐渐转向基于低运输成本考虑的近岸外包方式。也就是说，过去更受大公司青睐的亚洲等代工区域，可能会让位给新进入的拉美、非洲等地。^②

这种转移的动向给传统代工地区带来了巨大威胁。作为全球最大贸易代工地的东亚地区，多年来一直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是既需要欧美的订单，以解决国内就业和推动经济发展，同时也充分认识到处于全球价值链末端位置的利润极其微薄；二是既希望提升管理水平和改善生产环境，又担心上升的成本会迫使订单转向成本更低的国家。因此，各经济体总是既担心来自低端市场的竞争，又渴望在全球产业链中迅速提升分工地位，于是不断尝试新的方法和模式，但仍不确信是否可行。

与此同时，在过去的 30 年里，以中国经济崛起为显著特征的东亚已成为一个独特的战略地区，东亚生产网络不仅向发达国家出口产品，也越来越多地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进口原材料和未加工产品；不仅体现为对上游市场的一定反制力，例如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力，也体现为对下游供应链升级的促进能力。因此，东亚地区所具有的经济影响力可能早已超过人们对

^① 麦肯锡咨询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进行的全球网上调查，共收到代表不同地区、行业、任期和职能专业的 639 名高管的回复。与其他地区的受访高管相比，亚洲发达国家的高管更为忧心忡忡：有 82% 的高管表示，在未来 5 年，自己企业的供应链风险会进一步增大。参见《麦肯锡：全球供应链将面临的挑战》，凤凰网，2011 年 3 月 17 日，<http://finance.ifeng.com/leadership/qyzt/20110317/3690912.shtml>。

^② 王中美：《全球价值链的新趋势、新平衡和关键命题》，载《国际经贸探索》2012 年第 6 期，第 108 页。

价值链末端市场的判断。

理论上，全球价值链为很多国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参与到供应链之中；但另一趋势则是订单在经济萧条时是走向集中而不是分散。从这个意义上说，转移可能是全球供应链中某些企业的选择，而削减供应链以集中于更专业的供应商则是另外一些企业的选择。在当前东亚各经济体的竞争格局中，内部竞争压力要大于外部压力，区域内转移是更紧迫的威胁。全球供应链将走向制衡时代，而不是“转移”和“地理格局变化”；供应链两端关系的本质仍是互补，而不是绝对的控制和被控制。因此，全球价值链整合中转移与升级的对抗，反映了对于东亚生产网络主导权和治理选项的不同认识，也预示着未来东亚区域合作的路径和制度竞争。

（三）东亚生产网络发展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关系和治理互动

伴随东亚生产网络二十多年的发展，传统价值链理论所认为的终极采购商能通过合同关系控制全球供应商的中心地位发生了变迁，组织全球供应链的核心市场已不完全是最终产品流向国，而有可能是众多中间产品的汇聚地。尽管价值链的层级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现实中订单不可能随时调整和转移生产。因此，全球价值链创造的贸易流向的区域化与扩散化，使得像东亚生产网络这样的处于价值链中下端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优势不容忽视。

另一方面，东亚生产网络本质上是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利用全球规模经济，在区域实行高度专业化分工，协调形成一体化国际生产，最大限度地追求全球资源整合效率和价值增值的经济结果。因此，跨国公司要实现由地理上分散和不完整的生产体系转向区域性甚至全球性一体化生产和分销体系的目标，就必须有效降低跨国协调成本，消除投资政策壁垒和加强区域经济集团化。同时，各经济体则需要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将各类生产、投资和贸易行为纳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之中，以充分发挥各自的要素禀赋优势，提升整体产业结构并实现均衡发展，增加自身在全球政治和经济力量中的话语权。可以说，东亚生产网络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相互依赖、互相促进的联系日趋显现。对两者这种联系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第一，东亚生产网络的根本基础是分工，分工产生的效率使得企业与市场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在区域经济合作的推动下，中间产品生产企业可以依托区域内经济体形成的地理上的“网格节点”，即结合处于不同区位的微观经济部门特点和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和环境特征，在区域分工中构建竞合关

系和网络组织形态。

第二，东亚生产网络在微观层面以跨国公司为主，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可以形成对包括研发、制造和销售在内的企业间或部门间的跨国生产协作。由于跨国公司具有“潜在的地理柔性”，通过全球战略布局将不同生产阶段分布在效率最高和成本最低的区位，灵活利用不同区位上成本、资源、物流和市场的差别获取利益。同时，在区域统一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机制作用下，东亚区域内各类企业共同参与最终产品跨境生产的体系将得以更为有效地运行。

第三，东亚各经济体在宏观层面依托各自的要素禀赋，以自由贸易和跨境投资为纽带，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强化“区域公共物品”的政策协调机制。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参与同种类最终产品的生产，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将通过整合既有 FTA 相关条款，统一减少关税和贸易壁垒，放宽贸易和投资限制，促进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发展，构建跨境生产的有利制度和政策环境，从而促进东亚生产网络日趋成熟和完善。

第四，东亚生产网络与区域内产业集群和各类企业的发展存在互动关系。经济全球化并没有降低生产的地理集聚，区域的空间结构也没有走向完全的系统平衡。从生产网络和区域经济合作的视角看，全球化力量促进了跨国公司生产活动的全球扩展和区域生产网络的形成，而地方化力量则导致企业更加依赖于区域生产网络，并形成不同的产业集群，^① 实现交易成本降低、生产效率提高和激励方法改进等多种集聚效应。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具有扩大地方产业集群，加快东亚经济整体“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作用，还将推动东亚区域内外经济体间的互动，促使企业不断创造和保持价值，丰富东亚生产网络发展的内涵。

因此，不断深化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加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为推动东亚生产网络发展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和治理保障。随着 1998 年“东盟+中日韩”合作机制的构建，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逐渐起步，并在 21 世纪初掀起了一轮签订双边 FTA 的高潮。但是，这些双边 FTA 在促进各经济体间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同时，也导致了“意大利面条碗效应”，阻碍了东亚区域内贸易规模扩大的可持续性，也使得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始终踟躇不前。特别是由于中日韩自贸区尚难建成，多种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并行，无法形成有

^① 刘春生：《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的路径选择》，载《中国经贸》2011 年第 2 期，第 71 页。

效的区域经济治理格局和统一的东亚自由贸易区，致使国际经济协调成本居高不下，从而对东亚区域内商品和资本的流动及优化配置，生产要素的转移、吸收和消化，以及东亚生产网络发展路径的优化构成制度和机制障碍，阻碍了在东亚地区形成更完整的国际分工体系和结构互动关系。

在后危机时代，美国以“经济再平衡”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战略东移”的实施以及对 TPP 的积极推进，对既有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路径产生了强烈约束。这种现实和潜在的战略牵制对未来东亚扩大内需，创建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寻求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一体化合作机制构成了巨大挑战。

三、美国的亚太“再平衡”与东亚区域经济整合的竞争

2009年9月，在美国匹兹堡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全球经济再平衡导向论”，即中国、日本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应减少储蓄和投资，扩大个人消费；美国则应鼓励增加储蓄、投资和扩大出口等。随后，美国政府明确提出以出口增长来刺激本国的经济复苏，将过去的债务推动型（或消费推动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出口推动型和制造业推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并以此增加就业。^①同年11月14日，奥巴马在其亚洲之行中正式宣布美国将加入 TPP，强调 TPP 将促进美国的就业和经济繁荣，并将为制定 21 世纪贸易协定标准做出重要贡献。美国贸易代表罗恩·柯克（Ron Kirk）也正式通告美国国会，美国将参与 TPP 谈判，并强调要建立一个高标准、体现创新思想、涵盖多领域和范围的亚太地区一体化合作机制。^②

TPP 是在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对当前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和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TPP 以全面零关税、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权利和环保等议题为特点，目标是建立高质量和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这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生产网

^① 金英姬：《全球经济“再平衡”对东亚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论文，2010年，<http://iaps.cass.cn/cate/1200-p8.htm>。

^②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Statement by Ambassador Ron Kirk on TPP”, Nov. 13, 2009, <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speeches/transcripts/2009/november/address-united-states-trade-representative>.

络格局和外部生存空间带来潜在的战略挤压和冲击。TPP的发展状况及美国在其中的作用，东亚生产网络格局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 TPP 与中国参与的东亚区域整合之间的机制竞争的走向，值得关注和思考。

（一）美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价值链升级与国际分工调整中的优势

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积极倡导全球经济“再平衡”，提出减少国内进口和适度消费，并争取在五年内实现“出口翻番”的目标。同时，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导致东亚区域外许多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不断升级，这使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东亚生产网络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下，美国极力推动 TPP 谈判，反映了其力图利用自身在东亚生产网络价值链升级与国际分工调整中的优势，对东亚生产网络格局，特别是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作用产生影响。

1. 美国利用产品内分工深化和其在价值链高端的“竞争性优势”，依托 TPP 作为贸易自由化平台，力图继续强化东亚在最终产品出口上对它的市场依赖。

国际金融危机使美国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停滞，消费需求下降，进而对东亚地区的进口需求下降。美国政府一方面制定了出口倍增计划，提出了让经济增长的动力回归到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再工业化主张，发起了“绿色经济运动”，并推行以新能源开发和节能为主体的“绿色新政”；另一方面，由于当前美国国内实体经济的“空心化”，新技术产业化和制造业再工业化短期内难以实现，因此，美国并不愿意减少同东亚地区的经济联系，而是力求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嵌入”亚太市场，甚至“嵌入”东亚生产网络中，以保持和加强对生产和生活性消费品供应市场的战略控制。TPP 正是美国未来主导亚太地区经济事务的平台，美国希望通过包括“竞争性自由化战略”^①在内的各种手段，增强亚太国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更好地控制供给市场，维持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中的依附地位，使其能够争取时间进行技术创新，形成生产能力，实现产业升级，再次抢占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制高点。

^① “竞争性自由化战略”是由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于 2002 年提出的，主要是指以美国巨大的市场机会为基础，通过多轨道（multiple front）和竞争性市场准入的方式，由美国主导区域或双边贸易安排，从而吸引和满足那些迫切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国家的需求，并进而通过签订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强化各国进行有利于美国投资和贸易的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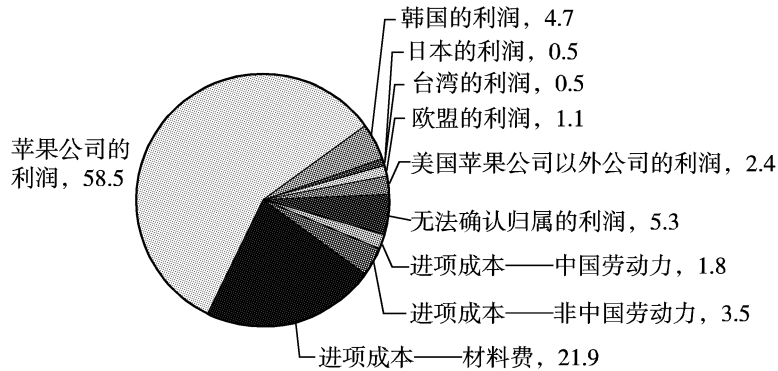


图 3 美国苹果公司 iPhone 4 手机的全球附加值分配情况 (单位: %)

资料来源: Matthew Jensen and Claude Barfield,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he Continuing Case for Free Trade: Trade Theory and Illustrati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 Asia”,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November 18, 2012, http://www.aei.org/files/2012/01/22/-global-value-chains-and-the-continuing-case-for-free-trade_151600345728.pdf.

从图 3 显示的美国苹果公司的产品在全球不同地方生产和价值链增值过程不难看出,美国在产品内分工中拥有研发与生产的核心能力及其衍生的价值优势,一旦美国以适度的技术价值转移为手段,吸引东亚生产网络不同经济体继续争夺外包市场份额,就会再次赢得对东亚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网络优化的发言权,这样既可以赢得国内经济复苏和“再工业化”的时间,又能在客观上破坏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自主性进程,实现其东亚区域地缘政治经济平衡的诉求。

2. 美国力主 TPP 条款实行高标准,力图通过制定新国际贸易规则使东亚生产网络调整形成有利于美国主导的“倒逼”格局。

在 TPP 谈判中,美国强调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条款和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条款,凸显了美国意图通过 FTA 相关条款的高标准,实现对东亚生产网络格局的固化,并隐含其转移国内落后产业的目的。一方面,由于美国在对外投资方面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因此其往往要求对方在市场准入、甚至政治和经济政策上承诺进行重大改革,从而寻求谈判各方实质上的“门户开放”,为美国推行其他政策创造条件,^①以进一步增加美国的经济收益。

^① 何永江:《竞争性自由化战略与美国的区域贸易安排》,载《美国研究》2009年第1期,第105页。

例如，在东亚生产网络中，各国原本需要合理引导外资使用，以保护和促进国内新兴产业的发展，美国却在 TPP 框架内主张“高标准”的国民待遇和投资规则，这无疑将给东亚后发经济体发展新兴产业制造障碍，阻挡其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增强美国对东亚的资金和技术控制。另一方面，就具体规则而言，一是在外资市场准入方面采用“否定列表”方式，^①并要求外资在进入东道国后须享受国民待遇，这将迫使 TPP 参与各方不得不修改大量的国内法和相关行政法规；^②二是美国主张将服务贸易模式 3（商业存在）的自由化谈判纳入投资领域自由化谈判项下；^③三是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上，美国拒绝适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国家间争端解决”方式，而是主张当外资企业遭遇争端时，诉诸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④由于该机制赋予企业起诉国家的权利，该条款可能引起极大争论，甚至涉及 TPP 谈判各国经济主权的部分让渡，^⑤其一旦实施，中国参与未来东亚经济合作的相关政策将受到此类贸易规则的影响。

3. 有效发挥 TPP 的战略价值，改变美国在东盟国家眼中的冷漠形象，吸引亚太发展中国家加入 TPP 谈判，推动美国战略“轴心”作用的实现。

一方面，美国力图改变自身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边缘地位，同时通过与亚太国家的合作，逐渐增强其话语权和影响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利用大多数亚太国家兼顾东亚一体化进程与参与 TPP 谈判的“骑墙”心理，不断扩大 TPP 谈判的政治影响力，吸引新成员加入，试图逐步形成由其主导的亚太自贸区框架，实现与现有东亚一体化机制分庭抗礼的局面。

① 所谓“否定列表”方式，是指一国在贸易领域的市场准入政策中，除明确说明现在及将来采取的保留措施和政策外，所有部门将一律对其他成员国开放。

② 沈铭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国的视角》，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1期，第6~34页。

③ 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将服务贸易模式分为4类：模式1（跨境交付模式）、模式2（境外消费）、模式3（商业存在）和模式4（自然人流动）。

④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最早出现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第11章C节。根据该节第1116条和第1117条的规定，一缔约方的投资者无需其所属国卷入，即可在无仲裁协议的情况下就另一缔约国或该国管辖内的地方当局违反 NAFTA 投资规则而导致其受损害的行为提请仲裁。

⑤ 张圣翠：《NAFTA 投资规则及其影响》，载《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2期，第156页。

从区域主义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来看,^① TPP 如同美国亚太经济“再平衡”战略下被推到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东亚各国国内利益集团会据此检讨本国贸易政策,评估和考虑由此带来的贸易与投资转移效应,最终可能寻求同美国建立 FTA,或者直接加入到 TPP 谈判中,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塌并向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贸易体系聚拢。同时,从“轴心—辐条”效应角度考察,当美国主动或主导与亚太地区国家缔结 FTA 时,美国就成为“轴心”,而与其缔结协定的各国则成为“辐条”,“辐条”数量越多,“轴心”国家就越占据主动,拥有的优势就越大,^② 而 TPP 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根“辐条”。多米诺骨牌效应和“轴心—辐条”效应都很好地解释了美国的亚太战略诉求,即通过寻求亚太主要国家对 TPP 谈判的响应,最终确立美国在亚太贸易体系中的“轴心”位置,进而形成对华贸易竞争压力,逐步瓦解现有的东亚一体化运作方式,^③ 最终迫使中国以较高成本加入 TPP,使其难以实现建立区域内消费市场、生产网络延伸和出口平台分散化的目标。^④

(二) 东亚生产网络“集散地”与中国经济崛起的作用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过去三十多年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 9.8%,对外贸易年均增长率达 17%,2010 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 6 万亿美元,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⑤ 尽管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也遭受了损失,但国民经济仍保持了稳健的增长势头。2009~2011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保持在 9.2%~10.3%,表明中国经济不仅已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迅速恢复,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引领了全球经济的复苏。

中国经济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东亚地区的贸易和投资格局,这不仅成为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源泉,同时也加速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对东亚地区总体上呈现贸易逆差,而对欧盟和美国则为贸易顺差。因此,中国

① 蔡鹏鸿:《东亚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载《当代亚太》2005 年第 3 期,第 4 页。

② 李向阳:《新区域主义与大国战略》,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 年第 4 期,第 8 页。

③ 包括协调的单边主义、非约束性自愿原则并配合经济技术合作。

④ 蔡鹏鸿:《亚太自由贸易区对 APEC 机制化进程的影响》,载《世界经济研究》2005 年第 2 期,第 9 页。

⑤ 《统计局:1978 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中国政府网,2013 年 11 月 6 日, http://www.gov.cn/jrzq/2013-11/06/content_2522445.htm。

经济已经成为其他东亚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即其他东亚经济体利用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包括制造产品和初级产品）作为其自身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已然成为全球供应链和东亚生产网络的“集散地”。

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东亚区域内经济体的“引力效应”，成为东亚生产网络重构的核心动力

为反映中国参与东亚产品内分工的程度以及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速度，本文根据联合国按宽泛经济类别（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 BEC）划分的国际贸易分类体系对中国中间产品贸易的相关指标进行了计算，结果显示，近10年来，中国与东亚地区的中间品贸易量年均增长16.7%，占中国与东亚地区贸易总量的比例高达60%以上，这说明中国目前主要是以产品内分工的形式参与东亚分工体系。相较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产品内分工，其更侧重于参与东亚区域内的分工，且程度日渐深化。地理上的邻接性使其迅速融入东亚生产网络。随着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地位的上升，其在网络中的贸易方向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由顺差国转变为逆差国。虽然中国对东亚地区的出口增长迅速，但其从东亚地区进口的增长速度更快，并且主要进口来源地是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由此导致了中国由商品净输出国到商品净输入国的角色转换，^①体现了其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较强的“引力效应”。

正是得益于以产品内分工为主导的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发展成为规模与深度兼具的制造基地，在制造业的大多数部门和生产环节都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特别是在电子、汽车、机械等以产品内分工为主的部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生产转移，尤其是日本、韩国等东亚发达经济体的生产转移。集聚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y）的循环累积效应使得中国的生产衔接能力进一步增强。根据阿恩特（S. W. Arndt）的观点，由于中国制造业的迅速崛起为东亚生产网络提供了更广阔的延展空间，很多生产活动可以外包给中国企业，而不必在东亚以外的其他地区寻找合作对象，从而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②中国在东亚分工体

^① 唐海燕、张会清：《中国崛起与东亚生产网络重构》，载《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12期，第63页。

^② S. W. Arndt, “Trade Integration and Production Networks in Asia: The Role of China”,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Working Paper, 2004.

系中的异军突起，引发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内部重构，网络成员的分工位置因为中国的参与而发生变更，其相互联系也因中国的连接而愈加紧密（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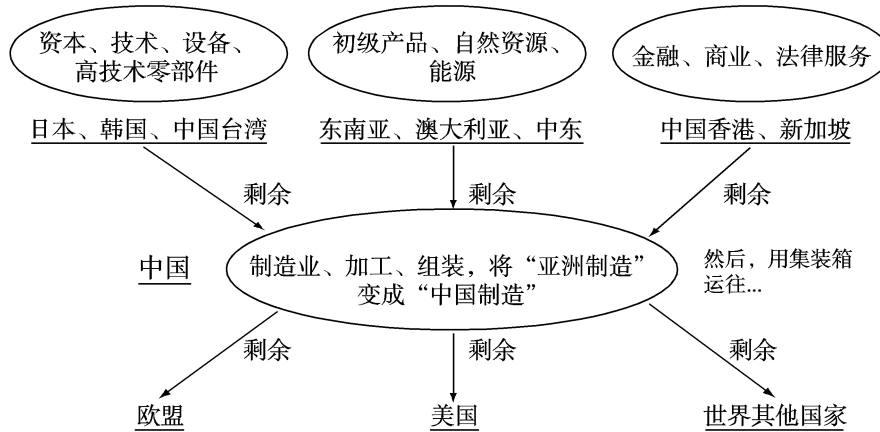


图 4 中国引领下的区域经济增长与整合模式

资料来源：黄朝翰：《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经济新秩序正在浮现》，载《亚太经济》2012年第5期，第4~5页。

当前，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比日本过去的发展过程更具活力，因为中国经济规模大，更具有多样性，其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因此，中国在东亚经济整合过程中的影响力及对东亚各经济体的引领作用也会更大，从而成为东亚生产网络重构的核心动力。

2. 中国的竞争效应推动东亚生产网络整体的专业化层次提升

随着网络分工的深化，中国凭借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提升了自身在消费品生产阶段的竞争优势，在网络内部的市场份额从1995年的31.7%上升到2006年的51.3%，并且其竞争优势进一步扩展到标准化的零部件和资本品生产阶段，市场份额分别上升了12个百分点和25.3个百分点。^① 亚洲“四小龙”则逐渐减少了加工装配领域的资源投入，重点进行复杂零部件和资本品的生产，将生产重心提升至精密零部件领域，从而推动专业化阶段向产品内分工的上层延伸。处在分工体系顶部的日本则逐渐退出大部分生产环节，仅保留一些关键零部件和资本品的生产，与此同时，将资源投入到分工体系最高端的研发设计领域，以维持对东亚生产网络的控制力。

^① 唐海燕、张会清：《中国崛起与东亚生产网络重构》，第68页。

虽然中国融入东亚生产网络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基础上，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核心能力的缺失，使其在东亚生产网络中长期处于从属地位；但是，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加快，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与其他经济体的联系正在不断加深，开始承接越来越多的来自东亚地区的生产转移。同时，伴随国内消费能力的迅速增长，对最终产品和服务需求层次的不断升级，中国也在采取有效措施，激励国内企业在价值链中高端形成本土生产能力，其国际分工地位正在逐步改善。^①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一方面调整、稳定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避免经济对外依存度迅速下降；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的提升，通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及相关投资协议的签订，中国已逐步转向亚洲区域内市场整合，加快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上向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的转变。2009年，中国对东盟国家投资总额为26.98亿美元，同比增长8.6%。^②通过扩大对外投资，中国正不断加强国内传统产业在区域内重新布局，推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改造，寻求逐渐在网络内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占据新位置。

3. 全球价值链整合的制衡与中国引领离岸服务发展在生产网络重构中的作用

根据格里芬等人的观点，全球价值链所联系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可以被看作治理体系，其治理核心始终是价值链的上端。^③理论上，美国作为终极采购商可以灵活转移和变动契约关系，但几十年来东亚生产网络所塑造的“三角贸易模式”仍然较为固定，中端的集成和组装能力和末端的专业化水平似乎都对价值链的竞争力较以前有更大的影响。也就是说，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新兴经济体不仅在向发达国家出口产品，同时也成为其他国家原料、基础产品和设备的采购商，即创建了自己的再下游供应链，从而也具有了价值链上的反制力与话语权，在地理格局上形成了集中与互补，而不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此外，中国利用加入供应关系所引发的学习效应，正在不断补全研发与生产能力和设计与市场营销能力的短板，并通过“生产者驱动”和“采购者

^① 刘中伟、沈家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对东亚生产网络的影响与中国的应对》，载《太平洋学报》2013年第1期，第65页。

^② 文中数据根据《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计算整理。

^③ G. Gereffi, J. Humphrey, and T. Sturgeon,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Forthcoming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 No. 4, 2003, pp. 5-11.

驱动”双轨并行方式，向产品价值链的更高端移动。在产品方面，中国通过核心部件的进口、学习、模仿乃至创新，在产品内分工合作中积累了高端产品的生产经验和必备技能。鲁特热（Lüthje）研究发现，中国大陆的电子产业在日本、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东亚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带动下，从简单的加工装配业务发展到复杂部件生产，乃至提供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设计服务，东亚生产网络内部的溢出效应推动了中国电子产业的快速升级。中国正处在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进程中，其分工地位逐步升级，这在资本品生产环节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核心零部件还依赖于东亚经济体的供应，但随着分工合作迈向更高层次以及学习和创新激励机制的促进，中国的零部件生产能力还会得到显著提高（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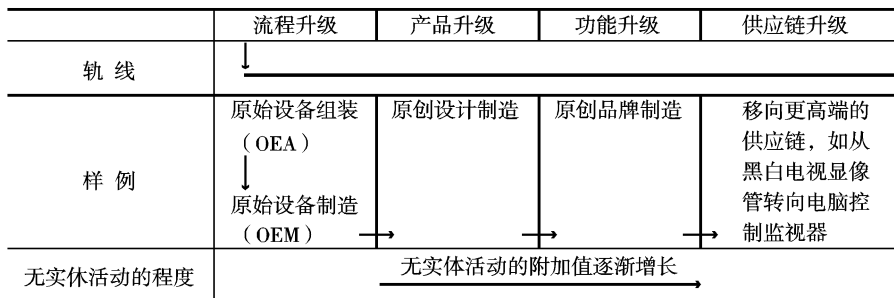


图 5 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产品领域价值链升级的可能路径

资料来源：B. Lüthj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China: The Case in Electronics Contract Manufacturing”, East-West Center Working Paper, 2004。

同时，《全球竞争力指数报告：2010~2011》显示，^①以中国为首的东亚经济体正在从“要素驱动型经济”走向“效率驱动型经济”，或者已经处于第二个阶段。如果希望在价值链中实现再升级，必须寻求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为此，中国目前正大力发展离岸服务，即利用国内相对较低的人

① 《全球竞争力指数报告：2010~2011》提出，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竞争力和稳定性的 12 要素包括：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健康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培训、货物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育程度、技术的完备程度、市场规模、商业活动的综合能力和创新。该报告认为，前 4 个要素为“要素驱动型经济”所需，第 5~10 个要素为“效率驱动型经济”所需，而最后两个要素为“创新驱动型经济”所需。参见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0-2011”, Geneva, Switzerland, 2012, http://www.weforum.org/docs/WEF_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_2010-11.pdf。

力成本、专业技能和外语能力，以在时区、地理和文化上与主要需求市场的相近性以及对教育投入、研发扶持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力推动等，扩大知识经济的规模，并减少对传统制造业或自然资源的依赖，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鉴于此，中国可能成为区域生产网络重构中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主要承载者和衔接者，进而引领整个东亚地区价值链转型升级的新阶段。

（三）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路径比较：“TPP 轨道”与“东盟轨道”

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下，以“TPP 轨道”为代表的新的亚太区域一体化路径打破了原有的区域合作均衡，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这种演变不仅在客观上要求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继续推动以“ASEAN+”模式为代表的“东盟轨道”区域经济合作，也为其在政治和经济上带来战略竞争，从而加剧了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区域生产网络重构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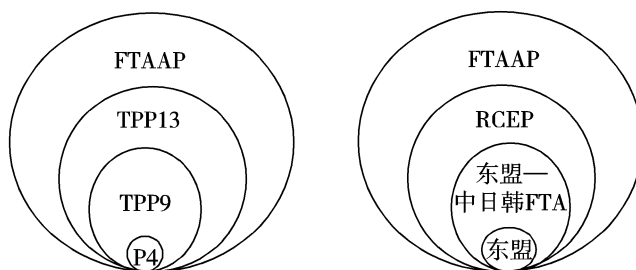


图6 “TPP 轨道”与“东盟轨道”的路径竞争

资料来源：Peter A. Petri, Michael G. Plummer and Fan Zhai,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Asia-Pacific Integration: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East-West Center Working Paper, No. 199, Oct. 24, 2011。

1. 实现 FTAAP 目标与美国主导的“TPP 轨道”

早在亚太“再平衡”战略推出之前，美国就一直力图淡化东亚区域概念，并试图将东亚合作纳入亚太合作的框架中，以防止在东亚出现一个类似欧盟的强大经济集团。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大力推动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发展，以加强亚洲与太平洋沿岸国家的经济联系，但由于 APEC 始终坚持自主自愿原则，导致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始终缺少制度约束和内在动力。面对东亚区域主义的迅速发展，美国政府试图重新“激活”20 世纪末“茂物宣言”提出的亚太经济一体化目标。2006 年，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起草了一项关于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

AP) 的建议, 此后, 美国积极推动将该建议纳入 APEC 贸易部长的工作范围, 并最终写入 2007 年的 APEC 领导人声明中。2011 年的檀香山会议进一步确定了 APEC 朝着一个无缝区域经济迈进的目标, 即加强成员经济体的一体化, 并通过“解决下一代贸易和投资议题”而扩大贸易。^①

然而, APEC 在推动实现茂物目标方面乏善可陈, 而且会议议题不断泛化, 缺乏再次激活其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实质动力。美国积极在 APEC 框架内推动建立 FTAAP 也始终停留在“深入讨论和研究”阶段。为此, 美国采取双边推动多边、次区域推动区域的方式, 以 TPP 为切入点, 吸引 APEC 成员国加入迂回达成 FTAAP 的“TPP 轨道”, 进而实现亚太贸易自由化, 防止东亚形成排他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 并最终建立由美国主导的亚太政治经济体系。

与此同时, 美国还力求通过 TPP 制定高标准的 FTA 范本, 以塑造未来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格局。当前, 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扩大多源于产业内贸易, 这反映了以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在不同国家进行为特征的东亚生产网络的重要性在不断提升。^② 而不断深化的东亚生产网络已经逐渐将美国边缘化,^③ 使其难以有效分享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美国将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标准、劳工标准、农业和服务业开放等议题纷纷纳入 TPP 谈判中, 目的就是在美国先进制造业实现全球生产体系布局的基础上, 利用 TPP 整合全球服务业, 运用其在贸易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 为服务业全球化的推进创造条件, 增强开发“亚洲广阔和不断增长的消费群的能力”,^④ 使其从太平洋地区和太平洋集团治理的角度, 为未来的全球治理提供一种新的范式。^⑤

2. “ASEAN+”模式与中国参与的“东盟轨道”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浪潮中, 鉴于东亚生产网络发展的现实、地区的政治

① 陈淑梅、全毅:《TPP、RCEP 谈判与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 载《亚太经济》2013 年第 2 期, 第 8 页。

② Vikram Nehru, “Southeast Asia: Will Markets and Geography Trump the TPP?”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uly 9, 2012,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2/07/09/southeast-asia-will-markets-and-geography-trump-tpp/cn3k>.

③ 林桂军、邓世专:《中国在亚洲生产网络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3 期, 第 222 页。

④ Hillary Rodham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October 11, 2011,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1/10/175215.htm>.

⑤ 全毅:《TPP 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 中美对话语权的争夺》, 载《亚太经济》2012 年第 5 期, 第 14 页。

经济形势以及地区大国的战略立场，东亚国家意识到，只有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掌握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主导权，才能维护自身的话语权和经济利益。因此，在东盟的积极倡导下，形成了以东盟经济共同体（AEC）为“轴心”、以若干个“10+1”自贸区为“辐条”的“ASEAN+”模式，并以此作为构建整个东亚区域一体化网络的基本框架。随着东盟—中国 FTA、东盟—日本 CEP 和东盟—韩国 FTA 等多个自贸协定的顺利签署和实施，东亚初步形成了经济一体化的大致轮廓。^① 2012 年 11 月 20 日，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东盟 10 国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领导人，共同发布了《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谈判的联合声明》，正式启动了这一覆盖 16 个国家的自贸区建设进程。^② 同日，中日韩三国经贸部长举行会晤，宣布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一定程度上标志着“ASEAN+”模式进入新阶段，即构建以中国经济成长为基础，以东亚生产网络重构为手段，实现东亚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共同发展的“东盟轨道”。在形式上，东盟仍拥有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轴心”领导地位，但由于中国能够对东亚经济整体运行施加巨大影响，并且其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也会影响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平衡和稳定，因此，“东盟轨道”的未来发展将可能实现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经济新秩序。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验表明，区域核心国家的主导与推动是经济一体化成功的关键。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对东亚出口产品和服务的巨大吸纳能力、人民币日趋成为区域内硬通货以及中国与域内外经济体不断加强的经济联系，决定了“东盟轨道”上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只能由中国主导实现。虽然东亚的经济发展格局十分清晰，但地缘政治形势却较为复杂。^③ 中国“和平发展”的政策理念尚未得到东亚国家的广泛认同，中国崛起在地缘政

^① 李文韬：《东盟参与“TPP 轨道”合作面临的机遇、挑战及战略选择》，载《亚太经济》2012 年第 4 期，第 29 页。

^②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基于“东盟+”模式，可以看作是中国支持的基于“东盟+3”模式（东盟 10 国+中日韩）的东亚自由贸易协议（EAFTA）以及日本支持的基于“东盟+6”模式（东盟 10 国加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的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CEPEA）的一种妥协。参见 Sanchita Basu Das, “Asia’s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East Asia Forum, August 27, 2012,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2/08/27/asias-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

^③ 黄朝翰：《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经济新秩序正在浮现》，第 7 页。

治上仍难以确定的形态消除邻近国家的不安全感和所谓“威胁”。同时，日本对历史责任感的缺乏，以及无法接受自身相对衰落和中国崛起的现实，成为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协定签订的最大障碍。此外，由于美国借“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东亚地区的深度介入，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将无法改变该区域的地缘政治形势。

未来一段时期，有中国参与的“东盟轨道”仍将建立在市场驱动下的东亚经济互惠格局的基础上，但随着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政治因素将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实现。如果中国参与的“东盟轨道”能够在一体化整合与治理机制构建方面取得深入进展，那么，如何与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秩序整合起来，实现东亚区域经济“实质性”的一体化，还有待观察。

四、东亚经济合作的未来及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比较东亚区域合作的不同路径，以及考察东亚生产网络的发展现实，可以发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方向正面临着在美国主导的亚太经济规则和新标准构建模式与中国参与的东亚经济务实合作和生产网络重构模式之间的“选择”。短期来看，鉴于东亚区域内中小经济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寻求同时参与“两条轨道”的一体化进程，而中国和美国也将在各自的“轨道”上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因此，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将会呈现出两种模式的竞争性发展势头；而在长期中，尽管中美两国在政治和经济上仍然会存在分歧和竞争，但在共享东亚经济福利、地缘合作和区域协调治理的巨大利益面前，双方将会不断调节、妥协以适应对方在一体化路径上的观点和政策，最终实现“两条轨道”的“统一”。中美双方就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的共识就是最好的例证。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当前在“两条轨道”的“并行”和竞争中存在诸多差异和分歧，但在未来双方可能的谈判中所形成的“并轨”机制或协议，将对东亚经济合作的模式提供最广泛和最有力的支持。

就此，本文对中国面对的东亚区域合作现实和东亚生产网络重构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从国内发展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已成为中国直面 TPP 挑战的根本之策。当前，中国国民收入总量不断增加，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人力资源素质也在日益提升，从而提供了改变中国对外部市场过度依

赖的机会。为此，中国一方面应积极推动自主创新，提升国家科研技术水平，大力扶持高新产业的发展，引导本土企业加强技术吸收能力，给予其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并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速度，提升产业层次，改变国际分工地位。另一方面，要不断扩大国内需求，改变长期以来经济增长对净出口的过度依赖，将净出口占 GDP 的比重降至合理水平，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离岸服务活动。

第二，从东亚生产网络格局的调整来看，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和实施，中国—东盟区域合作机制已达到较高的制度化水平，双方经济呈现出明显的相互依赖性。然而，鉴于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一直落后于东盟对华投资，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对称依赖，中国企业可以考虑加大对东盟成员国的投资，通过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 TPP 的优惠关税继续对美国出口产品，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与此同时，继续推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将高标准、高质量的 TPP 条款，有选择地吸纳到中国的自由贸易发展战略中，降低未来可能的制度变迁和市场开放成本。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美国可能采取“纺纱前沿”^①等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因此，在越南、马来西亚等 TPP 参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如果要利用 TPP 优惠关税，就只能从 TPP 成员国购买相对昂贵的半成品，而无法像目前一样，从中国进口相关半成品，最终可能导致利润受损，东亚生产网络也可能因此受到破坏。当然，中国是否推动相关产业转移以及转移规模有多大，主要取决于未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速度、中国内需扩张的水平和 TPP 谈判的结果，目前还很难做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

第三，从 TPP 本身的发展来看，虽然谈判各方一再声明希望达成协议，但最终谈判能否达成尚存疑问。中国应正视 TPP 的发展现实，充分掌握其发展动态，理性地做出战略判断和选择。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其一，如何整合 TPP 相关谈判国已签署的近 30 个双边和多边 FTA 以及与尚未建立 FTA 谈判国间的协调问题。根据 TPP 谈判的现状，如果 TPP 仍以双边方式就特定商品进行原产地规则谈判，那么仅就原产地规则而言，TPP 就不可能是有效的，不过仍是“意大利面碗中的一根面条而已”。^② 其

^① “纺纱前沿”（yarn-forward）原产地规则是指以纺织品为例，要求进入美国市场的服装等纺织品，从纺纱、织布、剪裁到加工成衣都必须在 TPP 成员国境内完成。

^② 刘昌黎：《TPP 的内容、特点与日本参加的难题》，载《东北亚论坛》2011 年第 11 期，第 12~19 页。

二，TPP 纲要文件与原有“P4 协议”在电子商务、金融服务、投资、电信和纺织品等相关条款上区别很大。由于各国国情和发展速度不同，谈判条款需要在宽泛和具体之间寻找平衡。随着更多国家加入谈判，各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可能更加凸显。其三，中美经贸关系是当前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利用双方经济上紧密的互补性，继续稳定和扩大中美经贸规模，可以部分抵消 TPP 可能对美国产生的福利效应，从而巩固中国在东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①更为重要的是，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应加紧研究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内涵，探索双方在经济增长、就业、物价、贸易和政府债务等更加广泛的宏观经济领域的合作。

第四，从区域合作层次来看，中国应积极参与 RCEP 谈判，利用自身在区域生产网络中的引领地位，推动 RCEP 东亚地缘政治和经济优势的发挥，研究开放条件下的自由贸易标准和规则的设定，彰显 RCEP 对 TPP 的制度和福利优势。首先，RCEP 框架是将目前东亚各经济体签订的各个 FTA 整合为统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的实质性步骤，中国应考虑以自身优势产业平台升级和产业链延伸为先导，将为东亚经济体提供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的具体建议落实于协议条款，从而适度减少邻近国家对中国经济崛起的不确定性，也有助于降低未来的区域治理成本。其次，相比 TPP 高标准条款的引领优势，RCEP 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例如，其强调通过协商方式作出决定，并允许东盟成员国享有差别化待遇，尽量充分考虑各经济体的需求，更好地满足区域生产网络供应链和创新需求。再次，中国和印度目前并不是 TPP 的谈判国，而双方均已加入 RCEP 谈判，两个发展速度最快且规模最大的新兴经济体的存在，无疑凸显了 RCEP 与 TPP 在发展前景上的不同，为未来东亚区域经济发展预留了更大、更具多样性的合作空间。

此外，中、日、韩作为东亚地区的三大经济体，在要素禀赋结构上存在极强的互补性，成为中日韩 FTA 构建的天然优势，对东亚生产网络的重构和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作为东亚区域合作基础的三个“10+1”能否最终转化为“10+3”，中日韩 FTA 能否达成，都是关系到 RCEP 最终能否实现的核心问题。就中韩 FTA 而言，因美韩和欧韩 FTA 均已签署，中国作为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自然成为韩国目前最重要的谈判对象。为此，中国在推动

^① 刘中伟、沈家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研究前沿与架构》，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1期，第58页。

谈判进程中应注意采取以下策略。一是应该吸取美韩 FTA 中存在诸多折扣性条款和补充条款的教训，宜采取不温不火的态度与韩国政府进行商谈；二是应稳妥地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逐步推动其经济福利效果的显现，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中韩 FTA 谈判中的分量；三是中国应借鉴韩国在美韩 FTA 谈判中的战术，寻求在“10+3”框架之外与其他发达国家展开 FTA 谈判，增加自身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主导权；四是参照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过程中的“早期收获”模式，在谈判市场准入议题时坚持“逐步开放、适度保护”的原则，从而有利于双方提高 FTA 谈判的务实性和积极性。^①

至于中日 FTA，其谈判能否达成的关键并不在于双方经贸领域是否存在分歧和竞争，而在于日本对于中国随着自身影响力的上升，挑战其东亚经济领导地位的对抗心理能否重回“平衡”。日本在推动中日韩 FTA 和加入美国主导的 TPP 之间持“骑墙”立场，力图通过推行不同自贸区模式，发挥自己在规则 and 标准制定等方面的优势，并通过联盟方式制衡中国。^② 在这种情况下，中日 FTA 能否实现可能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给日本带来的潜在经济红利能否足以让其放弃政治上的考量。由于日本长期奉行外向型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金融危机导致的美国消费需求的缺口能否由中国市场来弥补非常重要。倘若中国继续加大中日经贸合作规模，利用国内市场消化更多日本出口产品，中日 FTA 的前景可能会更明朗。此外，2012 年 5 月，中韩两国已先行开启 FTA 谈判；同年 11 月，中日韩三国宣布启动 FTA 谈判，正式拉开了这一关键进程的序幕。然而，囿于中日领土争端、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和日本政府缺乏历史责任感等政治因素，推进实质性谈判进程尚有难度。因此，适时达成中韩 FTA 的“早期收获清单”，也可能“倒逼”日本尽快考虑推动中日韩 FTA 谈判的实质性发展。

^① 刘重力、盛玮：《中日韩 FTA 战略比较研究》，载《东北亚论坛》2008 年第 6 期，第 54~60 页。

^② 王玉主、富景筠：《中日韩自贸区的进展与前景》，载《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07 页。